

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

张泽洪^①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系,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郑观应受聘买办长达20年,但长期以来,因偏重其思想研究,学术界将其买办经历给掩盖了。透过贯穿其整个前半生的买办生涯,我们不会不得出这样的认识:一是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二是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前驱之一,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经济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关键词:郑观应;买办;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K251; K82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432(2001)04-0042-04

Comprador ZHENG Guan-ying's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Capitalist Nature

ZHANG Ze-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circles have stressed the study of ZHENG Guan-ying's thought for a long time at the expense of his twenty years' comprador career. Retrospecting his comprador career in the first half of his lifetime, we shall get to know that ZHENG has strong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and that he i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o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propelling Chines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comprador; modernization

长期以来,对郑观应的研究因偏重思想研究,而将其买办生涯给掩盖了。郑观应承担买办的时间长达20年。他先于1859年入英商上海宝顺洋行担任买办,一干就是10年,至1868年因宝顺停业而离开;后于1874年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理,兼管帐房、栈房等事,“连战”8年,直到1882年入轮船招商局任专职帮办止。^[1]他在太古颇受器重,且

职务高,相当于中方总代理,独挡一面,权力很大。

由于对近代中国苦难历史的痛切反思,思想界赋予了买办研究以鲜明的民族批判意识。买办被冠以诸多“荣誉称号”,成为一切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和走狗的代名词,被视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

^① 收稿日期:2000-12-15

作者简介:张泽洪(1974-),男,湖南株洲人,湖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

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1]

不可否认，一些买办在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确实充当过助纣为虐的角色，充当过西方对中国殖民掠夺的帮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具破坏性。但是，“买办的情况是复杂的，所以在分析时一定要避免绝对化。”^[2]“民族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各个阶段，都有政治上进步的与落后的两个集团，但这样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同外国资本家的经济关系，兼有买办职业的资本家不一定都落后，不兼买办职业的资本家也不一定都进步”。我们分析郑观应的买办生涯，亦应按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分析。

一

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

受聘买办期间，郑观应对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横行不法颇为愤懑，洋人“既入我中国营生，当依我中国规矩”，“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他极力揭露外国“贩人出洋之举”和奴役华人的罪行，使被拐者“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鞑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3]他们“常受外洋之辱，而莫可伸诉”。因此，他建议“何不照欧洲各国之法，于海外各国都、各口岸、凡有华人贸易其间，居处其地者，则为之设领事官”，以保护华商的利益。^[4]同时，他郑重警告外国，中国“目下不过为势所迫，暂忍一时，岂得以一时少拙，遽视为砧上肉，釜中鱼耶？”^[5]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对外国的侵略手段，他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意识到，外国的侵略是多层次的，既有有形

之侵略，即军事侵略；也有无形之侵略，即经济侵略等等。“今洋人恃势从横，观衅而动”，“尊已抑人，任情蔑理”，“小则教堂滋事，各省纠缠，大则兵船示威，多方恫喝”。^[6]他提醒国人，列强的眈眈虎视，不可不防，如再不知振作，就有如“患瘵疾，妄用补剂，而此身渐弱矣”。他希冀当道诸公励精图治，“凡有利于军务国政者，一洗因循观望之习，而立长驾远驭之方，毋使环而相伺者得狡然以逞也。”^[7]在经济侵略方面，他分析道“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今者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他建言“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新约，凡西人和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8]他认为，在中外贸易所征收税收方面，华洋也极不平等：“外国税货出口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他深有感触地说，“华人厚待西人者如此，西人薄待华人者如彼，天下有此理乎？”^[9]

从自己经营企业的实践中，郑观应也深切地感觉到，滞碍中国发展的阻力主要来自外国。为此，他积极寻求御侮之方，“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10]用洋人之长技与洋人竞争，明知对手强大和创业艰难，也义无反顾。他深信，民族企业多争一分利，外资企业就会少收一分益。

大约在1867年他参与创办公正轮船公司，而遭排挤徒挂董事空名的时候，就对华商附股外国公司“不乐自居华商之名”的现象很不满意，主张由中国人自开公司，创办企业，以夺回利权。1880年，织布局在开办之初，为加强同外国资本竞争的能力，郑和戴恒等人就请求“上海一隅，只准他人附股，不准另设”。在经营中，郑再次提出“准给年限以防外人争利”。可见，他抵制外国在中国设立纺织厂的思想是坚定的，而且他本来不想当织布局总办，之所以终不辞者，以此事关系到“利源外夺”的问题，因此，他要“力底于成”。^[11]1881年，面对“各口通商码头，自洋人设立电报以来，华商日困，市情朝暮反复，

洋商操纵自如”的局面,他呈请清政府架设长江、闽浙等处电线,以利商务。^[1]1882年,郑观应离开太古转任招商局专职帮办也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意识。这年,郑同太古续订的五年雇佣合同期满,他对究竟是继续留任买办还是转任招商局帮办“心若辕辕,殊难意决”。^[2]就个人利益而言,继续做买办无疑是“长局”,放弃买办而入招商局则是“短局”,但他权衡的结果还是放弃获利丰厚的买办职位而进报酬较低的招商局,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中国航运业的心情早就很迫切。他对招商局的前途忧心忡忡,“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侮。”^[3]

二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他“集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近20年的买办生涯中,郑观应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本。国外有些学者认为郑在买办期间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暴发户”,虽有些夸张,但也并非空穴来风。他在太古的年俸达7000两以上,额外分红还要比这多得多,而他所开设的主要为太古服务的揽载行等商号的盈利,也是很丰厚的。这就为投资民族企业打下了物质基础。^[4]加上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观念转变很快,能在其他阶层尚未萌动之前,就率先投资近代企业。1868年,郑离开宝顺后,即当上了和生祥茶栈的通事,不久就与卓子和一起承办了这个茶栈,同时还经营荣泰驳船公司。1872年郑观应“腰缠10万上扬州”,当上了宝记盐务的总理。在太古期间,不仅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占股份”,而且,继在开平煤矿投资入股后,于1881—1882年间,又积极联合盛宣怀等人集资开采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等处五金矿藏。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

开始创办,郑即有资本投入。1881年,开办津沪电线,他亦有不少股份,并于1882年主持筹集股金开设造纸公司。有人估计,郑在任买办期间,对中国新式企业共投资约40万两。^[5]不仅自己提供资金,郑还在亲友中广泛筹集资金。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初始,彭汝琮、龚寿图等人对于筹集资本一筹莫展,郑入局后局面就大为改观,重新筹集到50万两资金,而且他所招之股“为数独多”。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掠夺,中国早期工业化面临着一个不发达经济的典型问题——即本国资金相对不足而借贷资金又相当昂贵,造成长期投资筹集资金困难重重。因而象郑观应这些买办所积累的巨额资金遂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故“买办以商本形式投资官督商办企业,或以股份公司形式集聚社会资金投向新式企业,有助于中国经济近代化。”^[6]

郑观应不仅是近代企业的投资者,也是管理者。在担任洋行买办期间,因他“深谙洋务,通达时务”;又“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7]富有经营新式企业的经验和能力,遂被邀参与了一些著名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1880年,盛宣怀邀郑入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不久,戴恒等认为织布局创办伊始,“事繁责重,必须有熟悉洋务,商务精勤练达之员,挈领提纲,主持全局,方免意见分歧互相观望”,故请委派郑为总办,李鸿章深表赞同,认为郑“才识兼优,条理精密,久为中外商民所信服。”是总办织布局的理想人选。^[8]郑在经营中也的确显示了难得的才干。他不是简单模仿西方,而是能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创新。他抓住三个关键问题进行改革:一是“求声誉素著之人以联众志”;二是“明示筹集之款以坚众信”;三是“专用西法以齐众力”。其他如机器设备、棉花质地、销售市场也都考虑周到。因经营得法,织布局在买地、建厂、购机、雇匠等方面都很有起色。同年,郑观应、盛宣怀受李鸿章委

派，在天津创立电报总局，开创了中国的电话电报业务，而此时电话这一技术在上也刚发明不久。1881年，受李鸿章札委担任电报局总办后，他深深懂得凡事“得人则兴，失人则败，故欲事之兴，惟在得人而已”的道理。在经营中，他抓住人才这个本中之本，提出“以造就学生而减报费为第一义，添招股本而加电线为第二义”的主张，大力培养人才以代洋工，因而虽任职时间不长，仍有不少建树。^[1]

郑观应对其它一些洋务企业的筹备，工程的设计，设备的引进等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是中国当时“第一等实业人才”，成为开拓中国新式企业的领导力量之一，为经济的新旧更替提供了动力，起到了先导作用。

总之，“判断一个阶级是进步还是反动，决定性的标准是看它所处的历史地位，所起的历史作用”。^[8]判断一个人同样如此，尽管郑观应仍不可避免的带有复杂的社会联系和旧社会土壤的印记，带有各式各样的局限性，

但这毕竟是次要的，是非主流的。透过郑观应的买办生涯，只要不存先入为主的观念，就不会不得出这样的认识：他是一个爱国者，并非附庸，更不是洋人的走狗；他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而不是中国近代化的障碍。

参考文献：

- [1] 夏东元. 郑观应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3] 日初，杜恂诚. 虞洽卿简论[J]. 历史研究，1981, (3).
- [4] 夏东元. 郑观应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 [5] 郝延平.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 [6] 汪熙. 买办和买办制度[J]. 近代史研究，1980, (2).
- [7] 王孝通. 中国商业史[M].
- [8] 汪敬虞. 试论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J]. 历史研究，1990 (3).

(责任编辑：骆晓会 英文译校：文爱军)